

計畫摘要

「三黨競爭下的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民國八十三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分析」係由國科會補助編號NSC 83-0301-H002-023，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執行的研究計畫。本研究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協同主持人為胡佛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陳德禹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梁雙蓮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徐火炎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吳乃德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洪永泰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明通台灣大學三研所副教授、游盈隆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等。

本研究計畫係對民國八十三年台北市長選舉活動進行的經驗

研究，研究目的在於瞭解選民的投票行為、政治體系的內容及其與投票行為之間的相關性。研究主題包括幾部份：第一部份，個人社會背景變數與黨派認同、投票行為間的關係：包括個人的社經背景、階級特性、集團體認同層次的觀察；第二部份為政黨偏好：包括政黨印象、政黨認同的方向及強度；第三部份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在族群認同方面，係以台灣人與中國人作為兩種認同方向，在國家認同方面，係以贊成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為光譜的兩端，探討此兩種認同彼此之間及其與投票行為之間的相關性；第四部份為「李登輝情結」，應用政治心理的概念與投票理論模型將「李登輝情結」予以概念化與測量，藉此分析大眾心理與投票行為的關係；第五部份為對政治態度與政治文化的觀察，第六份為對政治參與、政治動員及候選人特質的觀察。

本研究計畫所採取的抽樣方法，係應用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原則(PPS)結合分層抽樣、等距抽樣法優點的多階段抽樣法。在問卷設計上，係採用結構型問卷中的限制式問卷的設計方式，包括小部分的開放式問題設計，主要是選民的政治立場，主張與見解、對統獨議題的意見與投廢票的原因等。

Electorate Voting Behavior in Taipei City under Three Party Competition: A Study of the 1994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ABSTRACT

"Electorate Voting Behavior in Taipei City under Three Party Competition: A Study of the 1994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is the title of a recent research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Workshop on Political System Change at the NTU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his project was financially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series number NSC 83-0301-H002-023). The project'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was Professor Chu Yun-ha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TU. The associate investigators were Professors Fu Hu, Te-yu Chen, and Shung-lian Liang, also of the NTU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Dr. Huo-yan Shyu and Dr. Nai-teh Wu, research fellows from Academia Sinica, Prof. Yung-tai Hung, Director of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of. Ming-tong Chen from the NTU Graduate Institute of San Min Chu I and Prof. Ying-lung You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Soochow University also assisted on the proje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was to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oting behavior of the electorate an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obtain empirical data for the study, we conducted a survey during the 1994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campaigns. Our survey research covered several different but related topics. First,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voters (including class characteristics and group identity) and their party affiliations.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origins of party preference, including the role of party images and strong party identity in determining preferences. In addition,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voting behavior. This was accomplished by measuring the extent to which voters identified with either 'Taiwanese' or 'Chinese' ethnicit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voters supported either Taiwanese independence or Chinese reunificati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Lee Teng-hui Complex' was another major topic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We measured the effects of the 'Lee Teng-hui Complex' using political-psychological models of voting behavior, and used our finding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psychology and voting behavior. In addition, we observed the role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voters. We also obtained measures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andidates. Finally, we measured the positions of voters on some special issues such as the politics of money, the problem that none of the three parties can win half of the seats, the grand coalition cabinet, and the split of the KMT.

Our research methodology utilized a multiple-stage sampling method that employed the principles of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systematic sampling. We designed our questionnaire to include both structured and open-ended questions. The questionnaire asked voters questions regarding their views on the political positions of the candidates, their opinions towards issues of independence and reunification, and the reasons why some voters cast invalid ballots.

研究計畫執行報告

壹、研究計畫主持人暨協同主持人

貳、研究計畫執行單位

參、研究計畫主旨

一、選舉研究背景

二、台北市長選舉的意義

肆、概念建構

伍、研究設計

一、問卷設計與變項測量

二、抽樣方法與樣本檢定

三、訪談與信度檢定

壹、計畫主持人暨協同主持人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爲：民國八十三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分析」研究計畫主持人爲台大政治系朱雲漢教授、協同主持人爲台大政治系胡佛教授、陳德禹教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洪永泰主任、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陳明通教授、暨南大學公共政策所梁雙蓮副教授、中央研究院徐火炎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吳乃德研究員、以及東吳大學政治系游盈隆教授等。表一爲本研究計畫成員的學經歷：

表一：研究計畫成員簡介

計畫	姓名	學歷	現職	經歷
計畫主持人	朱雲漢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副教授
計畫協同主持人	胡佛	美國 EMORY 大學政治學碩士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美國耶魯、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
	陳德禹	台灣大學政治學學士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系代系主任、清華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兼任教授
	洪永泰	美國密西根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政治大學選研中心主任	東海大學統計系主任、行政院衛生署技監室專員
	徐火炎	美國佛羅里達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員、東吳大學社會系講師
	吳乃德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梁雙連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暨南大學公共政策所副教授	行政院研考會三處代副處長
	游盈隆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師

	陳明通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 士	台灣大學三民所教 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 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約聘 研究員
--	-----	---------------	---------------	---

貳、計畫執行單位

本研究計畫係由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爲研究室」執行。

參、研究計畫主旨

一、選舉研究的背景

選舉是現代民主國家中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也是非民主國家政體轉型、朝向民主化的重要機制，選舉的成敗關係到一國政治體系的發展與民主政治的前途。在常態民主國家，選舉的作用，是定期提供選民表達他們對現任政府及政府領導人施政表現良窳評價的機會，也是定期提供各政黨，以政見和施政能力為號召來爭取選民支持的機會，選舉的結果會影響政府政策的走向，政府的更易，或甚至政黨制度的重組(*realignment*)，惟較少涉及政治結構或國家結構的調整。但在政體轉型中的國家，選舉所帶來的政黨競爭往往是環繞著政治結構或國家結構正當性的問題，而選舉結果對政體結構所可能產生的衝擊，也是相當的強烈。在臺灣，選舉正是推動威權主義政體轉型與民主化過程的關鍵性社會機制 (Hu and Chu, 1991)。尤其是中央層次的國會選舉，提供了政治反對力量成長及凝聚的場域，也提供了對威權政體不滿及渴望民主改革的選民一個低成本的集體行動的合作體制 (Chu, 1991)。

因之，對選舉行為的檢視，在現實上自有助於掌握未來的政治方向；在學術探究上，選舉行為則構成政治行為科學的研究重心。我們從選舉行為的研究中，不僅可以探尋政治參與的結構、類型與模式，更可驗證假設並建構理論。誠如政治學者Stein Rokkan(1970:172)所指出的，選舉及投票是一經常性的群眾政治活動，而能為政治行為的科學性探究，提供一歷史難得的群眾行為的實驗場。事實上，整體政治行為學的進展，就是源於選舉及投票的研究與促動。Heinz Eulau(1968:208-209)即指出，在1960以前，政治行為幾乎就是投票行為的同義字，Kenneth Prewitt及Norman Nie (1972:479)亦指出，假如剔除投票行為的貢獻，將很難想像美國政治理論會成怎樣的狀況。

選舉及投票行為之所以對政治行為的實證性及理論性探究具有重要的貢獻，主要在其本身的特質。首先，政治體系的運作在本質上就是行動，所以政治學者終不能不將行動的研析置於核心的地位。選舉行為即是一種外顯的行動，我們可從行動的觀察進而探究所反映的內在態度，以從事理論的建構。近年來，政治學者特別重視政治行動，而視態度為必要的解釋變項，就是來自這種認識與努力。

其次，政治是一種集體性的活動，而選舉則是此種活動的最佳展現。不但如此，選舉活動不僅在時間上具有持續性--定期進行，並且在空間上具整體性--普及各個區域。對政治學者而言，選舉的集體活動所展現的這種時、空兩個面向的特性，非常有助於比較分析與反覆驗證，而為科學性的理論建構所必需。再者，選舉行為的研究乃是根據各個選民的個體行為，進行集體的類型分析與理論探索，所以在性質上仍屬於個體研究(micro study)：但這種個體研究，如前所述，具有時、空兩個面向的延展性，因而可進一步作為整體政治變遷與發展的分析指標。換言之，對選舉行為如能做長期性的比較研究，即可在個體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總體研究(macro study)，而能對政治發展及民主化的理論建構有所貢獻。

最後，選舉行為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對於研究政治變遷地區的政治學者而言，無論在理論層次或資料累積方面皆相當重要。詳細地說，七〇年代中期後，從南歐、東歐、拉丁美洲，到東南亞三十餘個國家，紛紛結束威權主義統治，轉而朝向民主改革的道路，政治學者Huntington稱它們為民主發展的「第三波」(Huntington,1991)。台灣亦處於變遷的行列之中，許多學者認為這是台灣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意識到其正當性發生危機而所採取的改革措施(若林正文,1987;王振寰,1989)，不過，正當性危機並不能完全解釋這些變遷現象，因為台灣進行改革的背景並不盡與其他國家相同，其中愈來愈具競爭性的選舉制度是一重要因素(Chu,1992)。選舉將台灣快速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結構變遷轉化為一股推動一黨威權主義轉變的關鍵性機制(Hu and Chu, 1991)。因此，今後台灣各項選舉的舉辦都將具有分析的價值與意義。

由上述可知，選舉行為無論在實際政治的運作上及學術理論的建構上皆具相當的重要性，使得這方面的研析，發軔甚早，收獲亦豐，其中以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gus Campbell 等教授所領導的「調查研究中心」 (Survey Research Center)及稍後的「政治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 貢獻最多。近二十多年來，學者對選舉行為的探究，且已不限於一時一地，而是在累積的知識基礎上發展理論架構，進行泛文化的長期性的橫面及縱面的比較研究，且多採用固定樣本追蹤研究 (Panel Method) 的集體研究方式。如：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Donald E. Stokes(1960)對一九五〇年代選民的比較研究；Norman H. Nie, Sidney Verba, John R. Petrocik(1976) 對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美國選民的比較研究；Sidney Verba, Norman H.Nie, Jaeson Kim(1978)對七個國家選民及有關參與行為的比較研究；Samel H. Barnes, Max Kaase等(1979) 對五個國家選民及有關政治行動的比較研究等皆是。

以美國為例，從「密西根大學」為主的選舉投票研究發軔以來，選舉投票行為的研究已成為政治行為科學中的主體。自一九七八年以後，密西根大學的選舉投票行為研究，更受到美國國家科委員會的長期資助，而成立定期性的「全國性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簡稱NES)。此後，美國的選舉研究不僅定期地研究美國的總統大選，也探討國會議員的選舉；參與研究的學人也不限於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與「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而已，美國各大學有關學科的研究者，也都紛紛被邀請加入全國性的選舉投票行為研究。於今，選舉投票行為的研究不僅是美國政治行為研究的顯學，在歐洲其他國家自一九七〇年以來，也紛紛成立類似的常設機構，定期作選舉投票行為的調查研究：例如在英國，以University of Essex大學為主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接續David Bultler與Donald E. Stokes (1969) 兩人對英國國會大選的研究之後，從一九七四年起定期作英國的國會選舉調查；在德國，全國性的選舉投票行為研究則由University of Cologne與Mannheim兩個大學為主體，自二次戰後以來一直不曾間斷地蒐集調查德國大選的選民投票行為；另外，歐洲共同體委員會，自一九七四年以來，也定期作所謂的Euro-Barometer

的一系列有關民意、價值變遷及選舉參與行為等問題的調查研究。對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而言，投票選舉行為也是比較政治主要的研究重點（Weiner and Ozbudu, 1987）。列舉各國對選舉投票行為的研究，旨在於說明選舉投票行為研究的研究，不僅由單一國家到跨國比較的研究，也從民主先進工業國家的選舉研究，而到關懷民主化過程中國家的選舉研究，有關選舉投票的理論也日益周延，對於整體政治行為科學的進展具有莫大的貢獻。

二、台北市市長選舉的意義

在民國八十三年年底舉行的第一次（直轄市）台北市長選舉，距離上一次選舉已有三十年的時間。毫無疑問地，台北市長所能掌握與分配的政治資源，絕非是一般中央民意代表或縣市長可比擬；進一步而言，處在當前中央與地方重疊嚴重的政治結構畫分之情況下，就影響的區域與範圍來看，作為一個台北市長的重要性，幾乎可以比擬與行政院長或總統。然而更重要的是，台北市長將是第一位經由選民直接投票選出的直轄市長。此外，台北市長選舉還具有下列特性與重要性：第一，就選民直接選出的政府首長而言，台北市長的選舉可能是總統及台灣省長外，層次最高而且選區也最大的一種選舉。在這種情況下，將來到的台北市長選舉必然是當前三大政黨所極力爭取勝選的主戰場，這是民進黨邁向執政之路的試金石，也是甫先成立之新黨唯一有機會爭取行政首長職位的選區。所以，無論選民或競爭中的三個主要政黨而言，台北市省長選舉的重大意義，已不言可喻。

第二，就選舉制度來看，當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所採行的選舉制度，可說是一種「多席位單一不可轉移選票制」（multimember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的大選舉區制，而縣市長選舉所採用的則是「單一席位多數決制」（single-vote plurality system）。在這種單一選區制的選舉競爭中，台北市長選舉的選區為很大，層級可說除了總統及省長外最高的。這種選舉競爭的情境，與美國的總統大選頗為類似。在這種選舉制度與政黨競爭的情形下，選民的投

票選擇就政黨選擇與候選人選擇而言，具有等同合致性。因此，台北市長選舉的研究，不僅可以探討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各種因素之外，在研究發現與理論建構上，可以和同樣是「單一選區」的美國總統選舉研究，來進行比較對等的相互印證。

第三，在位階上台北市長的選舉，是地方自治的一種選舉，但從上述所指出的重要性來看，與全國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比較，重要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更重要的是，在總統直接選舉在今年三月舉行以前，直轄市長選舉是一項空前重要的一次選舉，政黨競爭之激烈與選民參與之熱烈，也是前所未見，民進黨與新黨候選人均所舉行群眾集會，在規模上均打破歷次選舉的記錄。因此，臺北市長的選舉是一種所謂奠基性的選舉，透過這種競爭熱烈參與層面廣大的重要選舉，不但牽涉到政黨重組，更在於顯示一個政黨執政更替的過程。無論從政治體系的總體面、或選民選舉投票行為的個體層面而言，毫無疑問地第一屆臺北市長選舉，都是研究台灣政治體系變遷與大眾政治的絕佳機會。它是觀察台灣整體政治變遷與政治民主鞏固的一次關鍵性選舉，也是進一步了解選民投票行為的天然實驗場。研究台北市長選舉投票行為所具有的重要理論性意義，分列於下：

（一）臺北市長選舉是「黨對黨」組織競爭為主導的選舉。隨著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出現，政黨組織在選舉競爭中的作用也更形重要。由於市長選舉是「單一選區制簡單多數決」競選，國民黨與在野勢力均推出所謂的「王牌」候選人出來競選，同時三大黨也卯足全力輔選黃大洲、陳水扁與趙少康。這種選舉與中央民意代表的「多席位單一不可轉移選票制」的選舉競爭，在競爭的型態上完全不一樣，換言之，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競爭中，一個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不只一位，也就是競爭中的候選人都必須面臨兩面作戰的困境：一方面與對立政黨的候選人競爭，另一方面也與同一政黨的不同候選人競爭。因此，在「多席位單一不可轉移選票制」的選舉競爭中，候選人取向的因素往往成為決定勝選的所在，政黨組織的作用相對被低估。在一對一的選舉競爭中，政黨組織的影響作用勢必成為主導的影響因素。

（二）臺北市長選舉是媒體競選的一場選舉。市長選舉的選區幅員廣大，

除了總統及省長外，上無其他選舉可以比擬，因此，在通訊媒體發達的今日，尤其是近年來傳播媒體逐漸被應用到競選以來，市長選舉的選戰大量運用傳播媒體（包括無線或有線電子媒體的電視、錄影帶、電台廣播，以及報紙、雜誌、文宣小冊與其他文字媒體等等），以深入遠及廣大的地理區域，來達到認知動員選民支持。這些新興媒體在選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政治動員的重要指標。

（三）臺北市長選舉是政見議題的選舉。既然臺北市長選舉的勝負，對政黨勢力的消長與台灣政治民主的鞏固，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作用，三大政黨均在選舉競爭中，提出有力動員選民的議題訴求。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運用以往的施政成效與未來的公共政策為訴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在尋求改變政黨形象的過程中，以「希望與快樂」為主調，強調公共政策與未來的施政保證為策略，避免談統獨問題，新黨則刻意拉抬國家認同問題的熱度，以「捍衛中華民國」為主訴求，同時兩個在野黨候選人均突出台北市的公共建設的弊端。此外，除了市政議題外，三黨競選議題會環繞在政治結構、國家認同、主權定位等政治立場問題上。因此，臺北市長選舉在我國政治發展史上具有特定意義，而一次大規模的選舉對政治轉型所造成的後續影響，也絕非歐美一次例行性的選舉可比擬。換言之，探討臺北市長選舉，不僅是驗證選舉投票行為的理論所衍生的種種學術上的假設而已，同時也是了解台灣未來政治動向的必要手段。

（四）台北市長選舉是一場「策略性投票」因素發揮關鍵性作用的一場選舉。台北市是唯一呈現三黨鼎立局面的大都會，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的基本票源十分接近，三黨都無過半的實力，而三黨皆有當選的可能。在選戰情勢的激烈拉鋸過程，三位主要候選人都試圖擺脫殿後的困境，以避免遭到有策略性考量的選民的放棄。策略性投票的因素，特別在「棄黃保陳」與「棄黃保趙」的傳言不脛而走之後，成為媒體的炒作議題，也成為引導選民判斷的新變素。因此，台北市長選舉成為第一個觀察三黨互動結構下的策略性投票的重要個案。

因此從投票行為研究的角度觀之，這次市長選舉提供了若干彌足珍貴的研究機會：（1）除了政黨與議題因素外，可以有系統地評估候選人個人因素及競

選策略因素的影響。(2) 檢視政黨因素是否因為選舉範圍的擴大而影響競選方式與投票行爲。(3) 在公共政策議題取代政治性議題的新趨勢下，議題因素對投票決定之影響是否更容易與政黨傾向區隔。(4) 支持特定的選民在其傳統支持的政黨當選機會不大的情況下如何投票？

肆、概念架構

在發展我們的理論架構時，曾檢視西方學者的有關理論與發展；後來在進行驗證時，發覺西方學者的選舉行爲研究始終受制於西方的政治環境，並深感我們據整體政治體系的概念以建立理論架構的必要。現做數點說明如下：

一、在選舉行爲的研究領域中，美國學者的貢獻可說最大，但在我們看來，這種貢獻，一方面受惠於固有民主政治的環境，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易為美國的政治環境所限制，而只能在穩定的民主政治體系內(within the system) 探究選民的選舉的行爲。從研究的內容看，美國學者從早期著重選民的投票率，以及投票與不投票的原因，後來才轉而著重選民的投票取向與投票對象抉擇的研究。從研究的途徑與方法看，曾先後發展生態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及經濟學等途徑，分別從事固定樣本追蹤研究法(panel method)，設立政治預存傾向指標(index of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以及建構「漏斗因果模型 (funnel of causality)」等。此一研究架構過去也曾為國內學者所引用，作為解釋臺灣地區選民投票選擇的解釋模式(參見：陳義彥；1982；雷飛龍等；1991)。這些研究內容、途徑與方法，對選舉行爲的研析確曾提供相當的貢獻，但在我們看來，這些貢獻僅在於對投票決定的探究，亦即只侷限在投票決定的分析架構。至於投票決定在整個政治體系的運作與發展上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則欠缺進一步的理論架構；換言之，美國學者的理論架構並不能用來觀察整體政治體系本身(of the system) 的運作與發展。就我國的情形而言，選舉的意義，不僅在於政治結構之上的功能運作，甚且牽涉到政治結構的本身。美國的選民大多取向於政府的一般公共政策，也就是政治體系的產出；而我國選民的投票取

向，則包括政治規範的維持與變革，以及政治體系的認同在內（參見：胡佛、陳明通：1986）。因之，我們無法沿用美國學者以功能為基礎的理論，而須發展以整體政治體系為分析對象的架構。

二、選民的投票決定在性質上是一種態度取向，本此取向而生投票抉擇的外顯行爲。美國學者對投票決定的觀察，即在各種途徑的運用下，大致歸納出數項主要的態度取向，即：政黨認同（partisan identification）、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及議題取向（issue orientation）。但此三種取向如何產生作用，美國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Rice(1928)的早期研究認為此三種取向是在選民對政治的基本態度：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的基礎上，產生交互的作用，做投票的最後決定。Campbell等人(1960)則進一步按取向的性質區分為政治性及非政治性，再就所產生的作用定為遠因與近因，而做漏斗狀因果關係的探尋。他們並強調政黨認同是一項相當穩定，具有常期持續性的態度取向，至於候選人取向及問題取向則視為短期的影響因素。政黨認同是一種對政黨長期性的感情，美國學者認定美國選民具這種感情傾向，當然與兩黨交替執政的政黨政治傳統息息相關。但在缺乏穩定的政黨政治的國家，政黨認同在研究架構中具有之意義，就必須重做考慮。實際上，根據我們過去的研究發現，政黨認同的影響，雖然會隨著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出現，而逐漸發生決定性的影響作用，但與其他的因素加以比較，其重要性且遠落在政見議題取向及各項候選人取向之後。由此可知，美國的選舉是傳統兩黨政治的運作過程，因而美國學者所著重探究的乃是這一傳統政治體系內的選舉理論；而相反地，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則說明台灣的選舉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推動現代政黨政治的過程。所以，我們認為用來研究台灣選舉投票行爲的理論，應是建構政治體系本身的一種選舉投票行爲理論。換言之，我們對選舉投票行爲的探究，不僅要從政黨看選民，還要從選民看政黨，看整體政治體系發展。

三、前述的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及問題取向等三項主要變項，對投票決定究竟具有怎樣的影響作用？這在外國學者間亦有爭論。近年來，Campbell等以政黨認同為中心的理論，即受到若干學者的非議。如Key(1966)即指出為數頗多的美國選民是取向於選舉時所爭議的問題，所以是「負責的選民」；其他學

者的研究也發現問題取向對美國選民的影響愈來愈大，而政黨認同則有減弱的趨勢（參見：Schulman and Pomper, 1975; Miller, Miller, Raine and Brown, 1976; Abramson, 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再進一步看，文化的相對性會造成投票取向在空間上的變異。如日本雖具有政黨政治的規模，但 Richardson (1974)即發現日本選民最主要的兩項投票取向是候選人與政黨，而候選人取向尤重於政黨認同；至於政見問題，反微不足道。根據上述，投票的態度取向具有時、空的因素，也就是會隨著時、空的變遷而變化。因此，我們很難僅具一時、一地選民投票的數項態度取向，建立一整體性的理論架構。根據前述研究同仁的發現，政黨認同也並非我國選民最主要的取向，我國選民最主要的兩項取向為政見議題與候選人成就，此與美、日兩國選民的取向類型亦不相似。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冒然將投票行為的觀察僅侷限於西方學者所提出的數項取向，而須建立更具有解釋能力的理論架構。

四、我們在前面曾論及美國學者所強調的政黨認同，如再做深入一層的分析，即會發現這一取向也淵源有自：如來自選民對政見議題的贊同，或出於對政黨人士的偏愛等等。Rusk(1982:92-96)近亦指出Campbell等可能一面誇大政黨認同的重要性，一方面低估政治議題的影響力；而政黨認同不過是議題或候選人取向的替代物而已，故應細加辨識。對美國學者近年來所重視的議題取向，他亦認為議題的要素不易辨識與解答，於是進而主張重視「立場議題」。但這些問題究具有怎樣同的政治特質，則並未做概念上的釐清。我們的看法是：應在實質上先對選民取向的政治性與非政治性加以辨識。（如選民對候選人的遭遇或膽識表示同情或欣賞，我們則必須進一步辨識這種取向究竟是來自於候選人的個人特質，或是受激於某些政治事件。如屬前者，則為政治候選人取向；如為後者，則為政治議題取向。）其次，我們對政治議題的特質也應作概念上的辨識與釐清，也就是應針對整體政治體系的運作與發展，分為體系的認同，規範的結構，及決策與執行的功能第三類。這樣的釐清，實際上也就是概念架構的建立。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我國的選民在體系認同上，具有國家獨立與統一之分；在規範的結構上，具有安定與改革之別；在決策與執行的功能上，則趨向社會福利與行政效能之差。比較美國所運用的自由與保守

(liberal-conservative) 或左、中、右 (left-center-right) 的概念構 (參見：Stimson, 1975; Miller et al. 1976)，應更能辨識議題的立場，也更能解釋投票理論在整體政治體系的運作與發展上的意義。基本上，我們認為選民的投票取向，應從實質上分為兩大類：政治性與非政治。政治性的取向應根據整體政治體系的認同，結構與功能加以觀察，不能含混看成體系內的一般政策；或僅探究一般公共政策，亦即體系內的功能性產生。我們應從體系內的功能面，提升到體系的各層面。用 Easton (1976:435) 觀念來說，我們不僅座著重「分配的政治」(allocative politics)，更應著重「系統的政治」(system politics)。在這次台北市長的選舉研究中，我們一方面延續過去六次選舉研究的觀察重點，以供做比較和長期分析之用。另一方面，我們在這次的市長選舉研究中，也有若干重要的改良。現分述於后。

1. 團體認同與團體意識 (group identity and group consciousness): 社會心理途徑的政治學研究自始即十分重視團體認同與意識對個人政治行為的影響 (Campbell et al., 1960; Verba & Nie, 1971)。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認知途徑 (Cognitive approach) 的政治心理研究更是大放異彩，有一躍成為政治行為研究主流的態勢 (Miller, 1986; Conover and Feldman, 1984; Kinder and Sears, 1986; Sniderman et al., 1987)。團體認同與團體意識的探討，在這類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殆無疑問。在台灣歷史與政治的脈絡下，族群認同與族群意識的孕育、形成與轉變和整體政治的脈動緊緊地扣聯在一起，亦深深地影響政治發展的道路。換言之，台灣人或中國人之認同感和意識之發展，早已成為左右台灣過去與現在政局走向的重要社會心理基礎。展望未來的發展，族群認同與意識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我們事實上很早即意識到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惟礙於時局的因素，僅以一兩道題目迂迴加以測量。目前時局因素的障礙已不復存在，我們也發展出較完整的測量工具，可以在這次研究中進行施測，對族群認同和意識的現象應能得到較確實、有系統的了解。

2. 階級認同與階級意識 (class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社會的階級與政治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反映在選舉與投票行為上，階級投票 (class voting) 在許多先進的工業與後工業社會一直都是顯著的現象

(Tings-ton, 1937; Alford, 1960; Dalton et al., 1984)在台灣的社會與政治脈絡下，儘管社會階級的區分不若歐陸工業民主國家那樣清楚，但隨著台灣整體經濟發展；工業升級的結果，社會階級的形成是必然的趨勢，社會階級（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政治角色，在整個國家邁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的世程中，有愈益突顯的可能。的確，假如說台灣社會的分歧結構(structure of social cleavage)的首要成分是族群(ethnic groups)，那麼次重要的成分就是社會階級。在這次市長的選舉研究中，我們亦針對了這個重要但卻一直未受到適度的關注的現象進行施測。我們一方面修改了傳統測量職業的方式，同時我們也新增了幾個題目來測量階級與階級意識。這種新的嘗試，相信對我國投票行為研究的充實有相當的助益。

3.政黨形象(party Image)。政黨形象向為國內各界，包括學界在內，所重視。但國內真正嚴肅地去檢視「政黨形象」的概念內含及其理論地位，以至測量工具等相關問題，可說剛起步不久。在二屆國代及二屆立委選舉的研究中，我們即開始試圖對這方面的問題做較有系統的處理。我們一方面採用傳統的開放式問題，如「在您的印象中，國民黨是怎樣的政黨？民進黨是怎樣的政黨？」；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努力去發展一些結構性、封閉性的測量方式，初步分析的結果也相當良好。在這次市長選舉的研究中，我們將針對「政黨形象」的相關問題做更進一步的處理。除了在二屆國代及二屆立委選舉研究的經驗基礎上，以結構性、封閉性的問題來測量選民眼中的國內主要政黨外，在開放式的問題上亦將用更精確的測量方式來探討政黨形象問題。理論上，政黨形象與政黨認同是兩個相互關聯，但彼此涇渭分明的兩個概念。政黨認同是一種較長期的心理現象；相對地，政黨形象則是一個中長期的心理現象(Trilling, 1976)。政黨形象的概念在研究政黨與選舉變遷的現象時尤其有用 (Prothro & Matthes, 1966)。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特別重視「政黨形象」的原因。台灣是處在一個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政黨形象的形成與轉變，可能對選舉與政黨體系發生較立即的作用。

4.民意與選舉議題。國內過去對選民政見取向的投票迭有爭議，而問題總是環繞在「台灣政見取向的選民有多少？」諸如此類的問題上。在此，我們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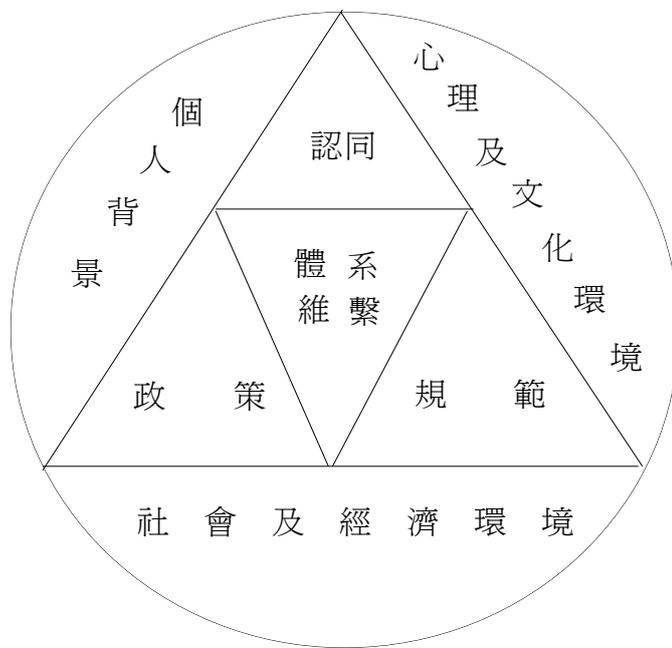
建議用另一種方式來思考政見取向的投票。也就是說，先不要問有多少人是政見取向的或有多少人不是政見取向的，而改問「選舉議題」(campaign issue)對選民的投票有多大影響力？何種選舉議題的影響力大？何種選舉議題的影響力小？事實上，也只有針對競選過程中出現的重大「議題」(issues)，以及政黨候選人與選民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的分佈，我們才可能較精確地掌握民意的歸趨，和精確地評估「選舉議題」影響選民投票方向的程度。有鑑於民意的難以捉摸，以及有感於過去國內選舉研究和民意測驗所用以探測民意的方法的不當與不足，我們在方法上做了若干新的嘗試和改良，希望能因而提昇我們掌握民意，了解民意的能力。這些方法上的新嘗試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我們要確認那些問題是競選過程中醒目而重要的議題(salient issues)。第二，要區辨選舉議題的性質。有些議題是屬「立場議題」(position issues)，有些則屬於具「價值共識」議題(valence issues)。基本上，為了突顯民意的分合，以便更精確地了解民意的特質，我們較傾向選用那些至少已呈現正反兩種立場的選舉議題。最後，我們在方法上有別於過去國內所做之研究，是在於我們改採美國密西根大學「全國選舉研究」(NES)所採用的標準問題格式。簡言之，我們對每一個重要議題皆做一個簡單扼要的背景說明，好讓每一位受訪者皆清楚他(她)們所要回答的問題是什麼。我們認為這些處理有助於增強信度和效度。

5. 「李登輝情結」。選民在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競爭性政黨政治出現與國家認同分歧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對主導台灣政治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會具有怎樣的心理取向；這樣的心理取向與選民的投票行為又具有怎樣的關係。在中智階層之間與新聞媒體上，「李登輝情結」可說是政治討論與對話中的流行語彙。我們應用政治心理的概念與選舉投票的理論模型，嘗試將「李登輝情結」的現象加以概念化與測量。基本上，我們可以將「李登輝情結」視為是「台灣結」與「中國結」兩種「集體潛意識」投射到李登輝身上的一種夾雜感情、想法與記憶的心理現象。在測量上，我們透過一般選民所熟悉的李登輝總統為對象，設計測量問題來了解選民回答時「腦海中立即浮現」的、關於李登輝的一組相互關聯的感情、想法、印象與記憶等心理取向。

如前所述，我們對投票行為的探討，著重體系本身的整體運作與發展，而

非僅在政策的價值分配，因之，我們對政治體系的觀察重點，非僅如西方學者所強調的由投入 (input) 經轉變 (conversion) ，至於產出 (output) 的價值分配過程，而兼重體系的規範與認同。現以圖1-1圖示如下：

圖1-1



上圖所建構的架構係由認同，規範及政策等三部分所組成，現分別加以說明：

一、認同部分。任何政治體系的維持，必須建築在成員間相互接納的基礎上，如其間發生排斥及分裂的狀況，體系的統合即發生危機。成員之間的相互接納可能來自多種原因，如種族、地緣、文化等等，但最終則出之於感情，即整體的歸屬或是親和感，如缺乏此情感，體系在根本處即難以維持。如投票行為所表現的意願是成員間的不相接納，此種投票即反映出體系認同上的問題。

二、規範部分。體系的運作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否則無論投入轉變及產出的功能皆無法進行，整個體系將陷入混亂的狀態。這套規則實際就是成員相互之間，決策及執行人員相互之間，以及成員與決策與執行人員相互之間在權力行使上應遵守的行為規範。依我們的看法，政治體系的任一環節在功能運作時，皆須具備一套規範，以劃分及制約上述人員相互之間的權力關係與行為。規範可為正式的，成文的，如憲法及各種法令規章；也可能為非正式的，不成

文的，如各種習慣及成規；但必須為相互所接受，不然不能產生規範的效果，反造成規範的危機，癱瘓系統功能的運作。

三、政策部分。施政是系統的產出，用以滿足及調和系統成員各種生活需要上的價值。一般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如前所述，都須遵循一定的規範，所以規範是政策的基礎結構，在性質上是較為穩固，而不易變動的。我們所觀察的施政即係指在規範基礎上所作的各種產出，而並不包括規範本身在內。當然，規範亦可作為產出而加以修定及調整，但我們則視為較根本的問題，已另分規範部份加以觀察。政策所牽涉到的問題，主要有二：其一是政策本身對系統成員生活價值的分配是否為系統所接受。我們通常所稱的政策好或壞，乃指此而言。其二是制定或執行政策的權威當局，在角色行為遵守上，或在能力表現上，是否為系統成員所滿意。我們通常所稱的澄清吏治，或提高效能等，乃指此而言。一般說來，生活價值的需求與滿足，常隨生活環境與生活資源的變動而改變，因之，政策的調整與改訂不僅不可避免，且為政策體系所經常運作的功能。在另一方面，權威當局履行角色行為及因應環境變動的能力，很易受主觀及客觀條件的限制，這自然也會造成權威當局的人事更易。政策所牽涉的兩項問題，即具變動性，且下為功能所運作的對象與範圍，如投票行為僅對政策部分作不同的要求，應為維持系統功能的所需，至少不致影響到系統的根本。

我們對政治體系有了以上了解後，就可建立分析架構將政治體系與選舉活動連結起來。我們先將選民分劃為投票與不投票兩種，因為選民在選舉期間，受到整體政治體系與個人背景因素的影響，在心理上對選舉會有所取向，並做最後抉擇，此抉擇即可分為投票與不投票兩種可能：一、決定投票，並根據投票的取向抉擇候選人；二、根據不投票的原因，選擇不投票。現分別說明如下：

就投票行為而言，我們在概念上將投票取向分為政見取向與非政見取向。政見取向係針對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問題而來，根據政治體系運作的層次，以及我們在研究中的驗證，這些政治問題，如前所述，確可分為三種政見取向的類型：一、體系的認同，二、規範的結構，三、決策及執行的功能。非政見取向可分為候選人取向與關係取向，而選民個人特別的因素也有影響，我們在觀察

時，如前所述，仍應區辨其中所含的政治性與非政治性。候選人取向可包括候選人的各種個人特質，如成就、學識、經歷、家世、風度等等。關係取向可再分為三類：

一、私人關係：指家人、親友等等；二、社會關係：指所自身或參與的社會關係，如所服務機關的同事，所參加社團的會員，以及同鄉會的同鄉等等；三、政團關係：指同黨的同志，政團的社員等等。根據上述投票取向，可再探討選民的投票原因，我們在幾次的研究中發現，選民決定投票，乃受到個人的、心理的、以及外在的影響，我們在分析架構中共列有下面七種原因：

一、公民責任感：投票參與是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倫理規範，基於遵守這一倫理的責任感，及決定投票。

二、政治信任及效能感，亦即選民的投票主要由於：1.相信整個選舉制度因自己的投票才會發生影響的效果，2.相信自己具有能力使產生理想的效果。

三、工具性投票取向：亦即選民認為可經由投票影響政治人物及公共政策。這一取向是視投票為一種工具。

四、政黨動員：政黨為了贏得選舉的勝利，常常運用嚴密的組織，透過不同的管道，動員選民投票，常成為選民決定投票的重要理由。

五、初級團體 (primary group)的影響：家人的親密生活關係，常對投票決定有影響。

六、次級團體(secondary group)的影響：選民的社會生活，也會造成相當緊密的社會關係，進而對投票決定有所影響。

七、候選人的囑託：在候選人的親自拜訪下，基於對善意及受到尊重的回報的心態，及決定投票。

就不投票行為而言，選民抉擇不投票，可能存有複雜的原因，其對選舉活動與政治體系的影響，往往不亞於投票行為。我們根據研究所得，在分析架構中將選民不投票的原因，分為兩大類共六種：

一、客觀條件：又可分為以下三種：（一）身體健康因素的不能去投票：

如生病、行動不便等。(二)自然環境因素的不能去投票：如天災、或地理上相隔太遠等。(三)社會環境因素的不能去投票：如受到社會團體的壓力等。

二、主觀條件：又可分為以下三種：(一)政治不信任感：不相信選舉制度本身能提拔人才，或不信任所選出來的候選人能為自己做事等。(二)政治疏離感：覺得政治太複雜了，而產生逃避心理，不過問一切正事，也不去投票。(三)功效意識低：不認為自己能從選舉中影響政治人物或政府的施政，乃決定不投票。

上述選民投票與不投票的行為與原因，當然會受到個人與環境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大致可分成兩類：一、個人的背景因素，二、心理及文化的因素。現分述如下：一、個人的背景因素：指個人的本身條件及社會與經濟的環境等，可再分為三類：(一)本身的條件：指性別、年齡、省籍、教育等等。(二)生長環境：指鄉村、城鎮及都市等等。(三)社會及經濟地位：指職業、收入、家世、政團及社團的參與等等。二、心理及文化的因素：指個人的心理特徵(如政治興趣、政治參與感、功效感、信任感、責任感等等)。

選民的政見取向、政黨取向、候選人取向、關係取向和策略性投票等態度取向，一方面受到個人的背景因素與心理及文化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影響對候選人的選擇。候選人可包括：一、國民黨提名，二、民進黨提名，三、新黨提名，四、無黨籍人士(包含脫黨與被開除黨籍者)。在選舉的過程中，上述的各種影響，實際上是經由媒介才能產生作用，這些媒介主要是候選人的競選手段及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與評述。整體看來，選民的個人背景與心理及文化等因素為我們架構中的獨立變項；態度取向則為投票行為的中介變項；候選人的選擇即是其相依變項。其間的影響過程，乃為媒體的作用。現再以圖1-2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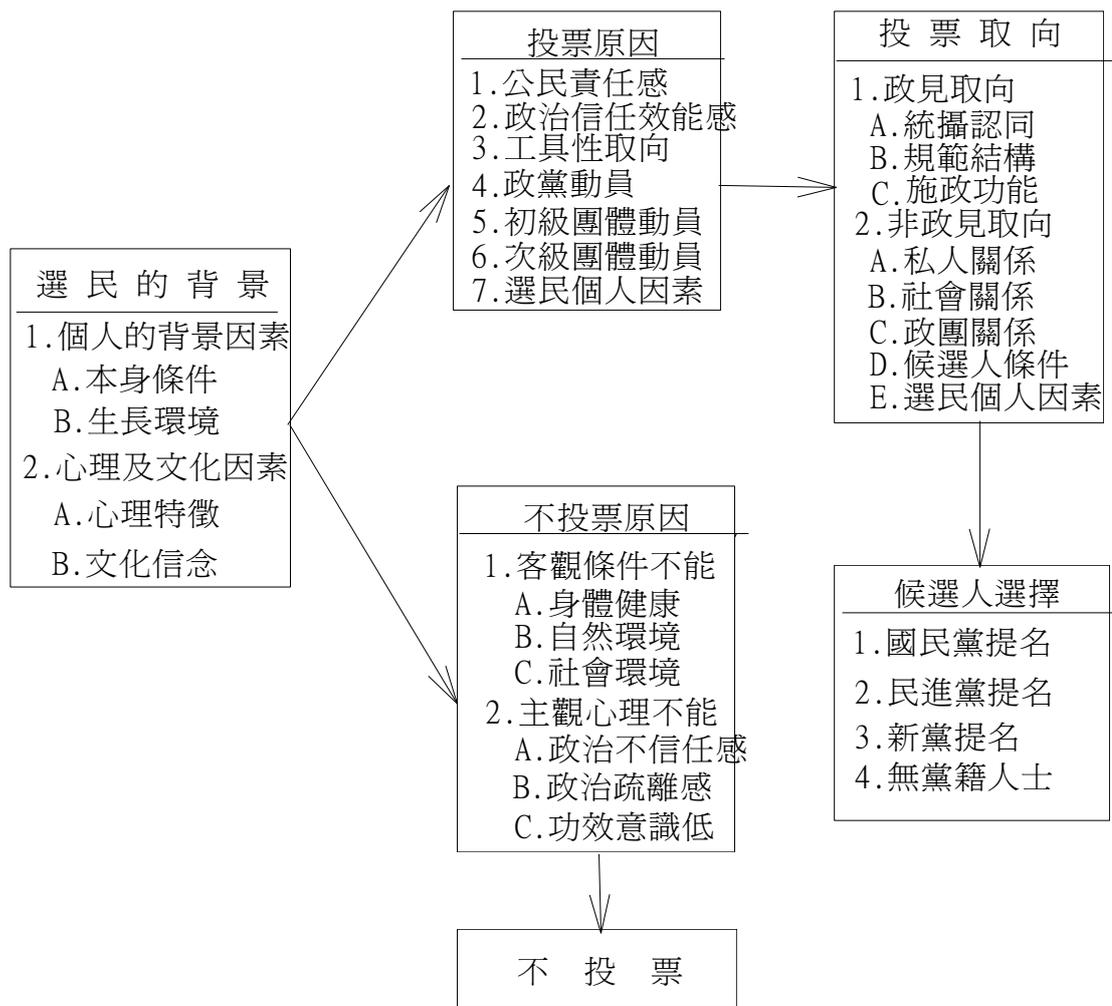


圖 2-2 概念架構圖

我們此次的專題研究計劃，即欲藉上述概念架構為研究的主要重心，且欲比較民以往選舉的選民投票行為，以解釋我國的選舉行爲，並進一步建立政治體系與選舉的「系統分析與比較研究」的實證性理論。

伍、研究設計

本章中我們將分別說明問卷設計與變項測量、抽樣方法與樣本檢定、訪談與信度檢定、資料性質與統計分析等部份。

一、問卷設計與變項測量

問卷設計由計劃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共同負責，在問卷結構的設計上主要採用結構型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中的限制式問卷(closed questionnaire)的設計方式，也包含小部份開放式問題(opened question)的設計。開放式問題主要是詢問選民贊同其所支持之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及主張、選民最希望該位候選人當選的原因，和選民最不希望該位候選人當選之原因。問卷結構可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包含社會背景變數中的基本屬性、政黨認同、政黨印象和族群認同，第二部份包含政治態度、投票原因、接觸政治消息的程度、政治動員、政治參與、議題、候選人人格特質和對選舉過程的看法，第三部份是社會背景變數中的階級特性部份，包括受訪者的職業及收入。

1、政黨偏好的測量

回顧歐美選舉行為研究的歷史，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一直是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也是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重要因素之一(Campbell et al,1960 Converse,1966:12)。在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中，政黨認同是連結政黨政治和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心理因素。在民國75年前，由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實施，限制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利，亦使台灣長期以來未有真正反對黨的出現。在缺乏政黨競爭的態勢下，選民較難產生政黨偏好，而綜合以往國內選舉研究的結果亦發現，我國選民多以候選人取向為決定投票方向的重要因素(陳義彥 黃麗秋,民81年)。

但在宣佈解嚴與開放黨禁後，選舉競爭已由過去的候選人或地方派系為主軸的選戰，逐漸加入政黨認同的動員與意識型態的攻防，因此選民在做下投票決定時，從以往只就候選人評價的判斷，開始加入了政黨偏好的成分。依據我們的研究架構，我們認為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並非完全客觀地比較候選人個人特質，而會因其他主觀因素的介入，使選民未將候選人立於同一立足點評價。我們的假設是，政黨認同會影響選民的候選人評價，而且此一影響方向為選民會對認同之政黨候選人持最佳評價，對他黨候選人抱持較低評價。

在政黨偏好的測量上，我們的題目是：「就國民黨、民進黨和新黨這三個主要政黨而言，請問在感情上您比較傾向接受哪個政黨？」，待選民回答其政黨偏好後，我們在以一道續問題追問其偏好強度：「【續問：請問您傾向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程度如何?】」。其中續問題的傾向程度，我們分成強烈

傾向、中度傾向、輕微傾向等三類。在我們分析上，我們只將選民的政黨偏好區分成傾向國民黨、傾向民進黨、傾向新黨和無政黨傾向三類，並無進一步分析傾向強度與候選人評價之間的關係。

2、議題立場差距的測量

在此次市長選舉之中，雖有環保、教育、交通、婦女、殘障福利、老人年金等議題的提出，但其獲討論與重視的空間遠不及於統獨議題。有關統獨議題的爭辯，延續八十二縣市長選舉的餘波，自選戰之初即成爲重要議題之一。自新黨候選人趙少康於首次電視政見辯論會中，公開提出「李登輝的台獨時間表」後，更是成爲市長選舉中三黨攻防的焦點，亦使本次選舉的議題層次由地方公共政策提昇至國家層次，而統獨議題也成爲影響選民投票決定最大的議題。

評估統獨議題對選民候選人評價的影響時，首先需注意選民主觀上是否認知統獨議題的存在，如果選民未認知道統獨議題的存在，議題因素無由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因此在問卷設計上，先以一題篩選題來過濾有認知統獨議題存在的選民，再針對有認知的選民詢問其本身的統獨立場，與主觀上三位市長候選人的統獨立場。我們的過濾題題目是：「國內對於台灣將來應該是獨立或與大陸統一有很多爭論。請問您是否聽過這方面的爭論？」，選民可選擇有或無，我們再針對有認知統獨議題的選民續問下一道題：「在這些爭論中，有人正爲未來台灣「獨立建國」比較好，有人認爲未來「統一」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怎麼樣？」，選民可選擇獨立建國、統一、維持現狀、無所謂和其他等共五類答案。

我們在選民回答認爲獨立建國比較好，或統一比較好之後，立即續問選民堅持此立場的強度，亦是將贊成統一或獨立的強度，區分成很堅持、贊成但不很堅持兩項。另外，針對回答「維持現狀」的選民續問：「如果現狀無法維持，您的選擇是？（答項：1.獨立 2.統一 8.不知道 9.不回答）」，希望能藉由假定的情況，瞭解回答維持現狀的選民，在現狀無法維持時的統獨立場抉擇。

詢問有認知統獨議題選民本身的立場之後，我們再詢問選民有關三位候選人的統獨立場，題目是：「請問就您所知，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三位主要候選人對這項問題的立場是什麼？」。最後，將選民和候選人依照贊成統一或獨立的強度，給予1到7的分數，置於一連續體上，透過方向理論的計算公式¹，得出每位選民分別與三位候選人之議題立場差距，再以此議題立場差距，進行以下的分析。

3、候選人個人特質的測量

本研究針對候選人個人特質方面設計五組題目，分別是針對候選人的能力、操守、瞭解民眾需要、值得人民信賴、認同台灣等方面，以期瞭解台北市

¹關於統獨議題立場詳細的給分方式與計算方法，請見本文第五章第二節。

選民對三黨候選人個人特質的看法。我們的測量題目是：「以下是一般人常提到做為市長的重要條件：能力、操守、瞭解人民需要、值得人民信賴、認同台灣等，這次市長選舉有三個主要的候選人，請問：在能力方面，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的能力怎樣？請問：在操守方面，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的操守怎樣？請問：在瞭解民眾需要方面，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是否瞭解民眾需要？請問：在值得人民信賴方面，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是否值得人民信賴？請問：在認同台灣方面，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是否認同台灣？」

其中「認同台灣」這項特質，雖是選民可認知的個人特質之一，但摻雜了相當程度選民對該候選人統獨議題立場的反應。如果納入分析，成為組成候選人評價的因素之一，我們在概念上即無法釐清議題與候選人評價兩者，而研究結果也無法區分議題與候選人評價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只將其他四項個人特質納入分析範圍。

二、抽樣方法與樣本檢定

在進行經驗研究時，如採取個體層次的分析方法，在資料的蒐集時，理論上應盡可能蒐集母體全體的資料，作徹底的觀察與分析。實際上，基於經費與時間的限制，無法獲得母體全體的資料，因此不得不進行抽樣，希望以抽取之樣本正確地推論母體。如果進行訪問時以單純隨機抽樣法抽取的樣本，推論時受到中央極限定理的保護，沒有樣本代表性的問題。但在分析資料時，不可避免的會因各研究目的的不同，必須針對不同的人口特徵做進一步的比較分析，且因為研究項目不會僅限於一個變數，將樣本依性別、年齡、籍貫、地區等研究重點因素細分開來，樣本裡各項重要特徵是否與母體一致，馬上受到嚴厲的考驗(洪永泰,1995)。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瞭解選民在三黨競爭下的台北市長選舉之中，候選人評價對選民投票決定相對影響力，因此抽出樣本不但需符合母體的重要人口特徵，更需注意樣本抽出的地區，在三黨得票比例方面，是否符合市長選舉三黨優勢地區的分佈。為符合本研究的需要，抽樣方法採取較複雜的多階段抽樣法(multiple stage sampling)，主要應用「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s,簡稱PPS)原則，結合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等距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等抽樣方法的優點，以求提高樣本代表性。以下介紹本研究相關的抽樣程序。

1、定義母體、抽樣清冊與抽取率

本研究的抽樣方法由洪永泰教授設計，採用分層分段系統抽樣法，以設籍台北市年滿二十歲以上的合格選民為研究母體，以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之台北市選舉人名冊為抽樣清冊。因本研究係針對台北市全體合格選民，進行

投票行為的調查研究，所選取之研究母體與抽樣清冊，不但符合研究主旨，亦較戶口資料來得精確。

一般而言，當樣本數佔母體比例百分之五以下時，樣本數的決定即不受母體數的影響。若以常用的95%信賴區間作為抽樣設計的原則，當樣本數在1000-1600份之間時，樣本分配大致符合常態分配，且抽樣誤差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如樣本超過1600份時，減少的抽樣誤差十分有限，卻增加相當多的時間與金錢，並不經濟，因此1000-1600是常見的樣本數（洪永泰, 1987:9）。因此經過仔細的評估，考量研究需要，和避免訪問區域過於分散，造成訪員實際訪問上的困擾等因素，並為配合訪員所能負責的份數，決定抽取率為1/1500，也就是在台北市1,817,282位合格選民中，抽取1200位作為訪問對象。

2、決定分層與分段原則

本研究之抽樣方法為求提高樣本代表性，增加推論的精確度，採取分層和分段兩階段抽樣方式。所謂分層即是將母體根據某些特徵加以分類，再在各層之內進行獨立的隨機抽樣；所謂分段即是在完成分層之後，進行各層內的分段抽樣設計，如此可以減少抽樣的工作負擔，並可提高推論的精確度。根據「同層之內同質性取其最大，異層之間異質性取其最大」的原則，本研究按民國八十三年台北市長選舉之開票結果，依三黨在台北市各投開票所之得票比例，進行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和區辨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先將全台北市1114個投開票所分為四到七群（見表2-1），作為決定分層數的依據。

表2-1 北市投開票所之集群分析結果

集群數	分 組 個 案 數	ANOVA	正確區辨率
四	552,138,324,100	F=1482.45 p<.001	92.91%
五	257,138,324,295,100	F=1590.55 p<.001	91.47%
六	257,138,148,176,295,100	F=1496.67 p<.001	90.66%
七	257,138,148,176,295,76,24	F=1475.52 p<.001	90.93%
八	213,138,148,176,295,76,44,24	F=1525.53 p<.001	91.65%

考慮正確區辨率、組間差與組內差的比例，及各層間個案數大小是否相近等因素後，本研究採取六層的分層法。因為將北市投開票所分為六層的分層法，其各層間個案數大小相近，且正確區辨率達九成以上，是較適合的分層法。表2-2中載明將全市所有投開票所分成六層之後，各層投開票所中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得票率之平均數。

表2-2 六分層中各投開票所三黨得票率之平均數

分 層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第一層	25.34%	34.57%	39.83%
第二層	25.18%	61.43%	13.09%
第三層	28.69%	53.75%	17.23%
第四層	26.61%	48.94%	24.14%
第五層	26.07%	41.79%	31.88%
第六層	23.43%	24.20%	52.16%
總平均	25.97%	43.70%	30.04%

區分成六層之後，採用「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s；PPS)的方式，將各層分成投開票所和選舉人兩段。考量為避免各投開票所訪問人數過少，將造成訪問區域分散、增加訪員工作負擔的問題，和研究地區過於集中，將造成訪問地區集中，可能會失去其他地區選民的重要資訊的缺憾，因此預計在每投開票所抽取原始樣本16人。並依該層選舉人數佔母體的比例，計算出該層樣本數的應抽份數，再配合各投開票所抽取16人的條件，求得各層實際抽取份數與投開票所數（見表2-3），進行雙重抽樣(double sampling)，共計抽取七十五個投開票所。並因研究設計需要，每個中選投開票所以等距抽樣法抽取16位原始樣本，以保持等機率抽樣的原則。

表2-3 六分層中各層實抽份數表

分層	投開票所數	選民數	佔母體百分比	應抽份數	實抽份數 投票所×人
第一層	257	429261	23.62	283	17*16=272
第二層	138	218400	12.02	144	9*16=144
第三層	148	237900	13.09	157	10*16=160
第四層	176	286176	15.75	189	12*16=192
第五層	295	485638	26.72	321	20*16=320
第六層	100	159907	8.08	106	7*16=112
合計	1114	1817282	100	1200	75*16=1200

3、決定受訪樣本與替代樣本

在確定分層抽樣得出的七十五個投開票所名稱之後，於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初赴台北市選舉委員會進行抽樣工作。自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公佈之台北市選舉人名冊中，抽中之七十五個投開票所選舉人名冊為抽樣清冊，以等距抽樣法抽出每投開票之應訪選民，登錄其相關資料（如姓名、年齡和戶籍地址）。為

確保足夠的樣本數，預留九倍之替代樣本，一旦研究進行時發生種種不可抗拒因素（如遷移、出國、死亡、服役等），或經多次查訪仍無法成功訪問者，即自預留的樣本中以相同性別、年齡之樣本，作為替代樣本之用。

經過詳盡的抽樣設計和質形成序後，本研究應訪選民1200人，實訪選民1184人，其分佈情形如表2-4所示。從表2-4中，我們可以瞭解本研究樣本的區域分佈、投開票所號碼、所屬分層、應訪樣本數與實訪樣本數之差。整體說來，樣本總數與分佈情形大致符合一般實證研究的要求。

由表2-4可以看出，某些投開票所之實訪選民數不等於應訪選民數，此肇因於某些投開票所因為替代樣本中符合原始樣本人口特徵者過少，改自其他同分層之投開票所，選取符合原始樣本特性之替代樣本進行訪問，或某些投開票所因種種因素，大多數民眾拒絕接受任何訪問。因此造成某些投開票所實訪選民數少於應訪選民數，而某些投開票所實訪選民數又多餘應訪選民數的情形，以致總樣本數未達預計之1200人。

表2-4 台北市中選之投開票所一覽表

區	里	投開票所號碼	分層	應訪人數	實訪人數
北投區	清江里	59	2	16	16
北投區	長安里	68	4	16	16
北投區	奇岩里	71	5	16	16
北投區	奇岩里	72	4	16	16
北投區	開明里	82	4	16	15
北投區	開明里	83	4	16	14
北投區	智仁里	92	5	16	16
士林區	仁勇里	117	3	16	16
士林區	承德里	148	4	16	14
士林區	明勝里	153	3	16	15
士林區	福順里	158	2	16	16
士林區	富光里	161	2	16	14
士林區	葫東里	168	2	16	16
士林區	富洲里	184	2	16	17
士林區	芝山里	200	4	16	14
士林區	三玉里	205	1	16	17
內湖區	西康里	248	6	16	15
內湖區	西安里	249	5	16	16
內湖區	葫洲里	312	1	16	16
內湖區	樂康里	317	5	16	16
南港區	三重里	334	3	16	16
南港區	中研里	365	5	16	16
松山里	新東里	388	5	16	14
松山里	精忠里	393	1	16	12
松山里	自強里	424	6	16	16
松山里	吉祥里	427	5	16	16
松山里	中崙里	438	4	16	14

信義區	國業里	497	1	16	16
信義區	中坡里	506	5	16	18
信義區	中行里	509	5	16	16
信義區	大道里	510	5	16	16
信義區	大仁里	514	1	16	17
信義區	惠安里	520	1	16	16
中山區	聚葉里	570	3	16	17
中山區	松江里	596	4	16	17
中山區	新生里	599	2	16	16
中山區	行政里	603	3	16	16
中山區	中原里	621	3	16	17
中山區	興亞里	622	4	16	17
中山區	朱園里	632	4	16	16
大同區	永樂里	652	2	16	15
大同區	大有里	661	2	16	18
大同區	延平里	664	3	16	16
中正區	河堤里	712	6	16	13
中正區	網溪里	716	1	16	16
中正區	螢雪里	726	5	16	16
中正區	愛國里	743	4	16	15
中正區	龍福里	754	5	16	16
中正區	新營里	757	5	16	15
中正區	新營里	760	1	16	16
中正區	幸市里	769	5	16	16
中正區	幸市里	770	5	16	17
中正區	文祥里	777	5	16	16
萬華區	福音里	801	3	16	15
萬華區	華江里	829	2	16	16
萬華區	榮德里	854	3	16	16
萬華區	凌霄里	865	1	16	18
大安區	民炤里	879	5	16	17
大安區	昌隆里	889	4	16	9
大安區	龍泉里	900	5	16	16
大安區	錦泰里	920	1	16	15
大安區	新隆里	929	6	16	14
大安區	住安里	938	5	16	17
大安區	義安里	942	1	16	17
大安區	黎元里	983	1	16	16
大安區	黎孝里	988	6	16	16
大安區	建安里	991	1	16	16
大安區	正聲里	1000	6	16	17
大安區	敦煌里	1001	1	16	15
文山里	景行里	1013	3	16	16
文山里	萬有里	1028	5	16	16

文山里	萬和里	1040	6	16	17
文山里	木新里	1087	1	16	13
文山里	樟新里	1098	1	16	15
文山里	萬芳里	1106	6	16	16

4、樣本代表性檢定

爲了解本研究樣本推估母體的精確程度，需針對樣本進行樣本代表性檢定，以瞭解樣本之結構特徵是否與母體一致。洪永泰(1995)認爲樣本代表性檢定應包括地區、性別、年齡、籍貫、教育程度、職業或從業身份、家庭每月收入等七項。在本研究的研究設計中，我們已利用分層抽樣的方式確保樣本的地區代表性，籍貫、教育程度、職業或從業身份、家庭每月收入等項，因爲以往各研究的定義與分類方法不盡相同，和部份人口特徵的資料取得困難，因此考量正確母體資料的取得與研究目的，我們依據民國八十二年內政部公布之人口統計資料，分別就性別、年齡進行無母數統計考驗(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Test)，下面爲初布檢定的結果。

表2-5 性別之樣本代表性檢定

	樣本	母體
男	586	578
女	598	606
合計	1184	1184

檢定結果： $\chi^2=0.225$ $df=1$ $p>.05$ 樣本與母體一致

表2-6 年齡之樣本代表性檢定

	樣本	母體
20—29歲	275	293.16
30—39歲	341	346.73
40—49歲	273	219.15
50—59歲	118	136.25
60歲以上	177	188.70
合計	1184	1184

檢定結果： $\chi^2=17.62$ $df=4$ $p<.05$ 樣本與母體不一致

由以上無母數檢定的結果可以瞭解樣本在性別的分佈上與母體一致，但在年齡的分佈上與母體並不一致，尤其在40—49歲這個年齡層與母體的差距最大。爲避免資料分析時推論的誤差，決定針對樣本的性別與年齡予以加權處理，以期樣本在各性別的年齡分布上與母體一致。權值的計算工式爲：

$$W_i = \frac{N_i}{n} \times \frac{n_i}{N}$$
 樣本數，
 的樣本數
 其中N為母體總數，n為
 Ni為第 i 層的母體數，ni為第i層

加權後的樣本代表性檢定如表2-7：

表2-7 加權後之樣本代表性檢定

	樣本	母體
男性 20-29歲	143	144.57
男性 30-39歲	164	165.89
男性 40-49歲	96	97.85
男性 50-59歲	66	66.26
男性 60歲以上	106	106.19
女性 20-29歲	153	150.07
女性 30-39歲	183	182.60
女性 40-49歲	118	122.41
女性 50-59歲	76	70.69
女性 60歲以上	85	83.47
合 計	1190	1190

檢定結果： $\chi^2=0.72$ df=9 p=1 樣本與母體一致

由表2-7可以發現，經過加權後樣本在性別、年齡混合分組上，檢定結果與母體一致，顯示樣本代表性已屬合格。說明此次的抽樣和執行，確實能夠符合精確推論母體的要求。

三、訪談與信度檢定

在完成抽樣設計與執行之後，計畫利用民國八十四年寒假進行實際訪談。進行正式訪問之前，我們統一寄出訪函（見附錄二），告知抽中之受訪者將有訪員至府上進行親身面訪。並由北部各大學徵得訪員95名，於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進行訪員訓練，講解本次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架構、問卷設計和訪問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由受訓訪員進行親身面訪。

經過三個多月的訪談後，共回收1184份有效問卷。為證實這些問卷的可靠性，確保本研究的研究品質，我們對已回收的問卷中依每一投開票所人口比例，抽出140份問卷進行複測，以瞭解問卷之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我們選擇複測問卷中較重要的兩題，做為再測信度的題目：1.是否投票，2.投給哪一位候選人。在計算再測信度方面，通常使用交叉列表的方式，觀察面訪和複訪的答項分佈，再以Kappa係數來計算兩次訪問中，選民回答的一致性。為瞭解再測信度是否合格，研究者將Kappa係數在0與1之間，區分成五等分，其中，0.41-0.60為中等，0.61-0.80為尚可，0.81-1.00為很好(Everitt,1992)。以下的表2-8和表2-9為兩題再測信度題目，答項的交叉列表與Kappa係數值。

表2-8 是否投票之再測信度

初訪	複訪		
	投票	未投票	不回答
投票	133 95.0%	1 0.7%	1 0.7%
未投票	0	5 3.6%	0
不回答	0	0	0

複測樣本數為140人 Kappa=0.82

由表2-8可知，在是否投票這個問題上，接受複測的140位受訪者中，只有兩位受訪者的回答不一致，約佔1.4%，而Kappa係數值為0.82。表2-9為檢定選民的投票對象的交叉列表，在140位接受複測的受訪者中，只有9.8%受訪者的回答與初訪不一致，而Kappa係數值為0.85。較特殊的是，初訪時不回答其投票對象的11位受訪者中，在複測時有5位說出的自己的投票對象，可能是初訪時對陌生的訪員有所排拒，不願回答真正的投票方向。表2-8和表2-9的Kappa係數值均在0.80以上，顯示本次研究的再測信度應屬合格。

表2-9 投票對象之再測信度

初訪	複訪						
答項	未投票	趙少康	陳水扁	黃大洲	投廢票	不知道	不回答
未投票	5 3.6%	0	0	0	0	0	0
趙少康	0	22 15.7%	0	1 0.7%	1 0.7%	1 0.7%	3 2.1%
陳水扁	0	0	65 46.4%	0	0	0	0
黃大洲	0	0	0	28 20.0%	0	0	3 2.1%
投廢票	0	0	0	0	0	0	0
不知道	0	0	0	0	0	0	0
不回答	1 0.7%	1 0.7%	2 1.4%	1 0.7%	0	0	6 4.3%

複測樣本數140人 Kappa=0.85

參 考 文 獻

一、中文部分

- 朱雲漢 1994 『政黨競爭、衝突結構與民主鞏固：二屆立委選舉的政治效應分析』，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
- 林佳龍,1989 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舉競爭及群眾基礎，臺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思伶,1989 性別與投票行為研究：七十五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婦女投票參與分析，臺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佛 1982a 『有權與無權：政治價值取向的探討』，載：楊國樞，文崇一編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專刊，乙種之10.381~416。
- 1982b 『政見取向的選民』，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17~195。
- 胡佛、陳德禹、朱志宏,1978 『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立與評估』，社會科學論叢。
- 胡佛、陳明通 1986 『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理論架構的建構與探討』，中國政治學會：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
- 胡佛、游盈隆 1983a 『選民的投票取向：結構與類型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 十一期。
- 1983b 『選民的黨派選擇：態度取向及個人背景的分析』。中國政治學會七十二年年會學術討論會論文。

- 1985 『選民的投票動機』M，社會科學論叢，第33期。
- 胡佛、張佑宗、歐陽晟 1994 『台灣價值分歧的結構及對統獨立場與投票抉擇的影響』，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
- 洪永泰 1987 『抽樣的原理和常用的一些抽樣的方法』，數學傳播11卷，1期頁5~12，民國76年3月。
- 1994 『配偶之間投票傾向的一致性分析』，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
- 徐火炎 1983 『選民投票的決定過程』，中國政治學會政治行為委員會，政治參與選舉行為研究會論文。
- 1994 『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行為』，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
- 陳德禹、陳明通 1983 『政治參與行為模式』，中國政治學會政治行為委員會：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研討會論文。
- 陳明通 1994 『尋找派系選民』，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
- 陳義彥 1982 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從民國六十九年恢復增額中央民代探析，台北：六國出版社。
- 陳義彥 1993 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檢討，國科會結案報告。
- 陳義彥、黃麗秋 1986 『選民政見取向的再探討』，載於陳義彥，曹俊漢主編，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治學會。
- 游盈隆 1982 系統取向與投票行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84a 『投票行為研究的緣起與發展』，東吳政治社會學報第八期。
- 1984b 『大眾政治與台灣政治自由化』，東吳政治學報第一期。

- 1994 『台灣族群的政治心理分析』，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
- 張佑宗 1991 民主轉型與台灣政治文化的變遷：一九八〇年代，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雷飛龍、陳義彥、丁庭宇等 1985 『民72年台灣地區增額立法委員之人文區位研究』，政大選學研究專刊第一集。
- 雷飛龍、陳義彥、丁庭宇、林邦傑、彭芸、黃維憲、劉義周等 1986 轉型期社會中的投票行為－台灣地區選民的科際整合研究第一期，國科會報告。
- 雷飛龍、陳義彥、丁庭宇、林邦傑、彭芸、黃維憲、劉義周等 1987 轉型期社會中的投票行為－台灣地區選民的科際整合研究第二期，國科會報告。
- 雷飛龍、陳義彥 1991，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國科會研究報告。
- 劉義周 1986 『國民黨責任區輔選制的效果：七十四年省長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分析』，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治學會編印。

二、外文部分

Abranson, Paul R,1975.General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s. Lexington, Mass.:Heal-th.

Barnes, Samuel H. Max Kaase,and et al..1979. Political Action :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Sage.

Bosco, Joseph.1991. "Taiwan Factions: Guanxi,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Local

- Poli-tics," mimeo,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 Butler, D. and Donald Stokes.1974.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2nd. New York, NY:St. Martin's Press.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Warren E. Converse,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Eldersfeld, Samuel J.1951. "Theory and Method in Vo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s.Easton, David.1976.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Suppor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Eulau,Heinz.1968. "Political Behavio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 Vol.1.New York: McMillan.
- Hu Fu and Yun-Han Chu.1989.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eds.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Boulder: Lynn Reinner.
- Karl, Terry Lynn.1991.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 Key, V. O. 1966.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1988. "Sovereignt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April): -
- Lon g, Samuel.1986.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Volume: Voting Behavior.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87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Volume : Voting Behavior.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Mil ler, Arthur, Warren Miller. Alden S. Raine, and Thad A. Brown.1976 "A Majority Party in Disarray : Policy Polarization in the 1972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753~778.

-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1976.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ie, Richard G., and Herbert F. Weisberg, eds. 1984.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2nd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Prewitt, Kenneth, and Norman Nie. 1972. "Review Article: Election Studies of the Survey Research Cen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Ric e, Stuart A.. 1928. *Quantitative Method in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 Rakkan, Siein. 1970. *Citizens, Election, Parties*. New York: Mckay.
- Rusk, Jirrold G.. 1982. "The Michigan Elections Studi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Micropolitics*. Vol.2.2:87~109.
- Scarborough, E.. 1987. "The British Electorate Twenty Years On: Electoral Change and Electoral Survey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219-46.
- Schulman, Mark A. and Gerald M. Pomper. 1975. "Variability in Electoral Behavior: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 from Causal Model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1~18.
- Stimson, James A. 1975. "Belief Systems Constraint, Complexity and the 1972 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393~417.
- Verba, Sidney, Norman Nie, and Jaeon Kim.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ner, Myron, and Ergun Ozbudun, eds. 1987. *Comparative Elec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